

顾保孜 ◎著  
杜修贤等◎摄影

真情实录

1949-1976

力  
量



毛泽东  
真情实录  
1949-1976



顾保孜◎著  
杜修贤等◎摄影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真情实录：1949-1976 / 顾保孜著；杜修贤等摄影.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008-6358-8

I. ①毛… II. ①顾… ②杜… III. ①毛泽东(1893~1976)一生平事迹—摄影集

IV. ①A75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1551号

(本书图片由北京红镜头版权代理中心提供。除署名图片外，均由杜修贤摄影。图片版权力求准确，若有疏漏，敬请谅解，并希望原创作者联系我们，以便再版时修正并支付稿酬。)

## 毛泽东真情实录：1949-1976

出版人 芮宗金

责任编辑 董 虹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005043(总编室) (010) 62005039(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3.25

字 数 310千字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8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 第一章 先生诞日人不晓

- 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律，打破祝寿遗风 / 3
- 六十大寿之际解决分裂隐患 / 6
- “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一次默契的合作 / 10
- 雄心勃勃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计划 / 14
- 毛泽东对失误和挫折主动承担了责任 / 21
- 对祝寿颇为反感 / 27

## 第二章 饮茶粤海未能忘

- 毛泽东论情论礼，很讲“朋友义气” / 35
- 泱泱大国的主席竟为他划船、陪他游园 / 40
- 毛泽东日理万机，竟三次与柳亚子和词酬唱 / 44
- “那是一件珍贵的文物，可千万别碰碎了” / 52
- 书画在毛泽东与齐白石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 / 58

### **第三章 痛失长子**

- 战争无情人有情，毛岸英踏上生死未卜路 / 65
- 岳母送给女婿的最后礼物——一支派克笔、一块表 / 72
-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 76
- 毛泽东像慈母一样关心着思齐的第二次婚姻 / 82

### **第四章 重上井冈山**

- 1965年，毛泽东选择在春天离开北京 / 91
- 井冈山的一草一木都令他思绪万千，心潮激荡 / 94
- 他一气呵成写了两首词 / 98
- 毛泽东内心深处的隐忧 / 104
- 毛主席来了！井冈山上的群众蜂拥而至 / 106

### **第五章 与李宗仁的历史性会见**

- 卡拉奇机场突然响起尖锐的警笛声 / 115
- 李宗仁夫妇踏上祖国的土地 / 120
- 李宗仁与溥仪像一对亲兄弟似地握手 / 124
- 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李宗仁 / 127
- “文革”期间，周恩来竭尽全力保护了李宗仁等一大批民主人士 / 133
- 毛泽东和李宗仁握手交谈：“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 139
- 李宗仁临终口授写了一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 / 144

## **第六章 两次庐山会议**

- 庐山真面何难识 / 149
- 出人意料的发难 / 155
- 1959 年庐山上的“神仙”会 / 162
- 打破庐山平静的一封信 / 168
- 林彪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 171
- 11 年后，林彪走完他的“O”形路 / 179

## **第七章 参加陈毅追悼会**

- 毛泽东的突然决定令所有人措手不及 / 189
- 毛泽东深深地三鞠躬 / 192
- 小小的打火机，那忘不了的遗憾伴随着杜修贤终生 / 198
- 毛泽东说了一句最令陈毅心寒的话 / 207
- 苦涩和悲怆的真挚情感 / 215
- 相见恨晚，相慰平生，遇事相商 / 218

## **第八章 与周恩来的特殊情谊**

- 忧伤深邃的瞬间，永远定格在历史的框架里 / 229
- 服从历史的选择，情同手足的合作 / 232
- 周恩来痛苦和违心的检查 / 239
- 忍辱负重，苦撑危局 / 245
- 揪人心肺的悲怜晚情 / 256

## **第九章 他改变了世界格局**

- 斯诺在中国的新闻没能引起尼克松注意 / 275
- 令基辛格遗憾的是，要把震惊世界的握手让给尼克松 / 279
- 是尼克松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他？ / 283
- 第三世界的朋友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 / 293
- 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 297
- 毛泽东潇洒自如地行了个“吻手”礼 / 302
- 毛泽东举起茶杯：“为冤家干一杯！” / 310
- 毛泽东面对镜头再也不能站立了 / 317

## **第十章 巨星陨落**

- 他的衰老再也无法躲过真实的镜头 / 323
- 毛泽东的当众批评，使得江青大丢面子 / 326
- 黄鹤知何去？心潮逐浪高！ / 330
- 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 / 337
-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 343
- 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 / 349
- 一息尚存，奋斗不已 / 351

第一章 先生诞日人不晓





## 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律，打破祝寿遗风

194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五十诞辰。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最为激烈、也是最为艰苦的一年，毛泽东原本就不喜爱过生日，这次大寿自然就没有祝贺。

第二年春天，有一次毛泽东邀请不少客人谈话吃饭。席间，续范亭先生问起了毛泽东的年岁和生日，毛泽东如实相告。续先生一算，去年不正是毛泽东五十寿辰吗？然而延安没有搞任何活动，各界人士也没有向他祝寿。续先生感到十分遗憾，也感慨万千，于是当即赋诗一首，献给毛泽东，诗云：

半百年华不知老，先生诞日人不晓；  
黄龙痛饮炮千鸣，好与先生祝寿考。

毛泽东对续先生是十分尊敬的，但对他写的这首诗只是一笑了之，不以为然。按毛泽东的想法，一个人的生日，最好是偷偷地过去，不要留下“岁月催人老”的感觉。

其实，毛泽东不为自己做寿，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

尤其是到了1944年、1945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也意味着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进入历史性胜利的关头。那时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不仅是领导全党全军完成抗日的神圣任务，还有中国共产党在日益强大进程中，如何防止骄傲自满情绪的出现。

当时，确实有人开始担忧，也有人提出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胜利后，会不会像历史上的农民革命那样，被胜利冲昏头脑，忘乎

所以，以致最后惨遭失败？会不会像封建王朝那样出现“人亡政息”的现象呢？

能不能避免农民革命的历史悲剧，能不能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律呢？这个问题提前进入了毛泽东的思考范畴中。

毛泽东熟悉中国的历史，也深谙辩证法。他深知千里之堤虽经得起洪水巨浪的冲击，但却难免毁于一蚁之穴；参天大树虽受得住狂风暴雨，但经不起钻心虫的侵蚀。中国共产党人虽不怕敌人的枪林弹雨，但却最怕遭受糖衣炮弹的“轰击”，党的领导人的骄傲情绪会导致党的肌体蜕化变质。所以，他宁愿防备一点。

恰在这时，1944年春，郭沫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甲申三百年祭》，以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打进北京城三百周年的文章，文中以大量的事实分析了起义军进入北京城后，由于多数起义首领骄傲腐化，又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最后导致起义军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严重失误而归于失败。这篇文章正中毛泽东下怀。他感触极深，把这篇文章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作为整风文件发了下去，要求全党全军高级干部好好地学习，开展必要的思想教育。

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又专门写信给郭沫若，谈论如何防止骄傲的问题。他在信中说：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后来毛泽东在报告中又曾多次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要求全党全军的“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不仅反对为他做寿，而且他还坚决反对为他塑像等个人崇拜的活动。1950年5月20日，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拟在沈阳市中心区修建开国纪念塔，并在塔上铸一尊毛泽东铜像。这件事报到毛泽东跟前，毛泽东大笔一挥：“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时隔五个月，第二份关于建立毛泽东大铜像的提案又报到了毛泽东案头上，这一次是北京市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提案，建议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树立一尊毛泽东铜像。毛泽东依然没有同意：“不要这样做。”

由于毛泽东否定了两大城市准备铸铜像的计划，其他城市也再没有理由“跟风”重提铸毛主席大铜像了，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制止个人崇拜，对稳定政局，稳定人心，赢得广泛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毛泽东不仅反对为他塑像，也反对为他修整故居。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专门给当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省委第一副书记和省人民政府主席的王首道，以及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的邓子恢写一封信，对湖南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为他修整故居房屋以及公路一事下了“阻止令”。毛泽东在信中说：

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进行在我的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

由于毛泽东的坚决制止，为领导人铸铜像，修故居，搞纪念馆、纪念塔之风没有刮起来，执政党在人民的心目中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与人民之间的距离是很近的。他随时随地都能听到人民的声音和要求。

到“文革”期间，毛泽东仍然反对为他塑像，他在1967年7月5日作过这样的批示：

此类事件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

但是，正值“文革”狂热时期，不少单位在“三忠于四无限”形势激励下，仍然塑造了很多的巨型塑像。一时间，毛泽东挥手的大型塑像在全国各地犹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至今，不少城市还能看见这一“文革”产物。

## 六十大寿之际解决分裂隐患

1953年12月下旬，马上就要进入60周岁的毛泽东，要离开北京到杭州去休假。说是休假，其实他还要在那里主持起草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他本该马上动身，但还是被高岗事件耽搁了。

这一事件还要从1952年8月中央调高岗入京担任职务说起。

可以说毛泽东对高岗一直是十分器重的。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同志及一批工作人员调到北京，并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以便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1952年8月，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陆续从西南局、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来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我们党在干部任用上，历来主张搞“五湖四海”，既量才适用，又考虑到历史形成的各个方面的因素。高岗来京之前已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时中央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安排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应当说当时高岗是很受器重的，权力、地位甚为显

赫，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他担任主席的国家计委亦有“经济内阁”之称。

但是，高岗、饶漱石权欲熏心，对这样的安排仍不满足。特别是高岗，对其副主席排名在刘少奇之后，一直耿耿于怀。他进京不久，就开始搜集刘少奇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并整理成材料，进行分发传播。他在材料里夸大其词地说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后来，他发觉毛泽东在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与刘少奇有不同的看法，不由得心中窃喜，以为刘少奇今后将不再受中央的信任，其威信和地位将发生动摇。于是，他授意别人写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一文，以他的名义公开发表。文中把刘少奇阐述过的关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观点、关于富农党员的处理问题的观点等等，一概当做所谓“党内的右倾思想”而加以批判，借以抬高自己，打击别人。

1953年年初，毛泽东认为政府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现象。根据他的意见，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并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即总党组），规定政府各部的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讨论决定、批准后方能报告。对政务院各口的工作，中央也重新作出分工：外交工作，由周总理负责；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的工作，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薄一波、曾山、叶季壮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农林、水利、互助合作工作，由邓子恢负责；劳动工资工作，由饶漱石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这是中央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但对于高岗、饶漱石来说，无疑就是当头一棒。因为他们一直以为

自己的权势在日益扩大，地位在不断提高，有可能担任更高的职务，而毛泽东这一体制的调整无疑阻碍了他们上升的通道。就在他们想办法“借题发挥”时，转机出现了。

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考虑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中央准备撤销中央局、大区行政委员会，并将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进行大幅度调整，人事安排也会作相应调整。

高、饶认为这是实现他们权力“目标”的好机会，于是借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之机，迫不及待地向党发难了。

这次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要讨论的议题是很多的。有“一五”计划的问题，也有如何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凡是不符合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的，必须坚决纠正。高岗利用“有错必纠”的会议宗旨，搞起了“反薄一波、倒刘少奇”的阴谋活动。他们把薄一波主张推行的“新税制”在工作中犯的错误夸大为路线错误。他们知道只有上升到路线错误，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才会终结，否则只是小打小闹，不能伤筋动骨。

所幸毛泽东及时地察觉到高岗的这个阴谋，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制止了财经工作会议上对薄一波的过分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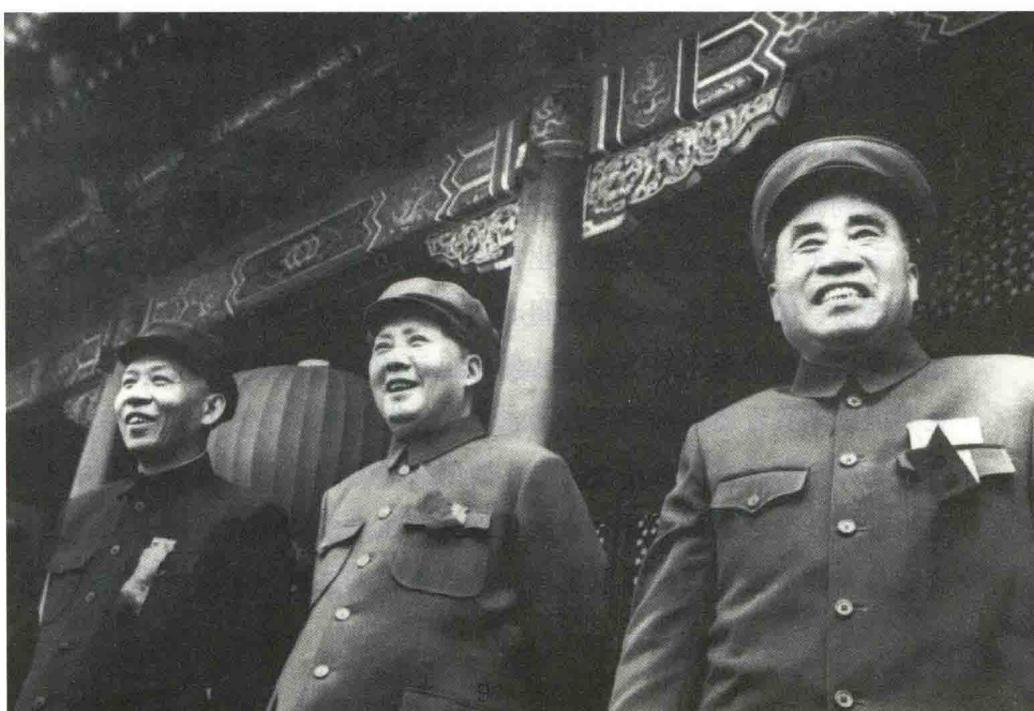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他认为，薄一波主张推行的“新税制”，即对国营企业、合作社企业、私人企业在税收上实行一律平等的税收制度，只能有利于私营经济，不利于国营经济。这是一个错误，必须坚决纠正。但是，毛泽东又指出，薄一波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是一个点的错误，一个点构不成一条线。“新税制”的错误是跟刘青山、张子善的错误不同的。“新税制”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刘青山、张子善是贪污犯罪的问题。同时他还肯定了薄一波在工作中的成绩。

毛泽东也对高岗、饶漱石发出了警告：现在王国甚多，八百诸侯，谁也管不了谁，有极少数人是坚决反对集体领导的。

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毛泽东这一番话，想必高岗、饶漱石是听懂了，听明白了。如果这样，他们就应该偃旗息鼓，不要再利用财经工作会议进行“反薄倒刘”的活动。

可是人一旦利欲熏心，私欲膨胀到一定程度，他们便会走向极端。高、饶便是如此，对毛泽东的讲话和警告置若罔闻。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高岗并没有停止“倒刘”的阴谋步伐，甚至变本加厉起来。饶漱石自被中央调任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后，见高岗十分活跃，常去见毛泽东，于是和高岗结合起来，配合高岗的夺权活动。特别是在 1953 年九、十月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他也公开地进行“倒刘”活动。一方面，他带头批判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另一方面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以此配合高岗的夺权活动。

1950 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在天安门城楼上。（侯波 摄）



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高、饶二人的阴谋夺权活动已经公开化，毛泽东不得不着手处理。但当时毛泽东还是希望以批评教育、加强团结的方法进行。然而，高岗利令智昏，摆出了不打倒刘少奇决不罢休，一个死胡同走到黑的架势。

1953年冬，高岗在严冬里却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像一把火燃烧着。他到处找人谈话，企图联合中央各方面的领导人与他一起“拱倒”刘少奇。他曾找过邓小平、陈云、彭德怀、黄克诚等很多老帅老将老领导们。甚至高岗的家也成了“倒刘”的战场，不仅会客室内放了不少刘少奇的讲话稿，随便让人翻阅，他也担任讲解员角色，大讲其讲话稿中有什么错误。

高岗如此九牛拉不回头，执迷不悟地深陷在散布反对刘少奇言论中，目的只有一个，把刘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毛泽东的唯一助手，这样将来才有可能接班做中国共产党的一号领袖。

高岗的所作所为，已经不再是有些夸大有些苛求或者性格有些缺陷的领导人了，而是已发展成为一个十足的野心家。

## “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一次默契的合作

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去杭州之前，依照过去的惯例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那天到会的有20来人，薄一波也接到了开会的通知。毛泽东在会上提议在他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此时被高岗、饶漱石的小动作搞得心情很不好。他在会上只顾抽烟，不多说话，他听见毛泽东这个提议，便用自己的方式婉拒了：“主席号召全党要谦虚，我看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好。”

毛泽东多少有些意外，他也只抽烟，不说话了。

他曾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重新强调了全党要谦虚：“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